

西游记研究资料

刘荫柏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游记研究资料

刘荫柏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26.875 插页 5 字数 527,000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25-0086-1

1·5 定价：9.50 元

前 言

《西游记》是一部伟大的神话小说，其内容之丰富，气魄之宏伟，不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步，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亦罕有匹敌者；兼以它的语言幽默，诙谐，在说说笑笑的谈神志怪之中常常透露出对人间冷峻的见解，故几百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以致其中人物早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了。

《西游记》作者为谁？在今天还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可笑的，因为现在稍有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它的作者是明代中叶伟大作家吴承恩。但是，吴承恩作为此书的作者，并不是很容易被人们认识的，而长期以来曾被误认是与此书毫不相关的人，即邱长春。

邱处机，自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生活于宋末元初之际，为全真教创始人王嘉的弟子。著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磻溪集》等书。元太祖成吉思汗诏邱处机，他率十几个门徒，“历四载”，“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始到达雪山（详见《元史·释老传》和《金莲正宗记》）。其门人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叙其事迹，现存《道藏》中。一者因《西游记》的几种明刊本均无著者姓名，二者因这两部书同名，后人不察，遂不免混为一谈。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刊刻《西游记证道书》一百回时，在卷首增添一

篇元人虞集《西游证道书原序》，“以为邱长春作，并谓得古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直至清末学术界、出版界都未弄清楚。钱静方在《小说丛考》中云：“《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注云：‘李志常述。’盖别有一书，余尝购得之，文仅数千字，非此俗传之《西游记》也。”李志常之作，约一万七千字，并非小说。在清抄本《四部备要》史部及《榕园丛书》乙集和《丛书集成》初编中《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序文，惟有西溪居士孙锡序，并无虞集序，在三种刊本书后收有清人钱大昕、徐松、程同文、董祐诚写的四篇跋文及段玉裁、张穆两则附语。钱大昕在跋文中谈到《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记》小说事，并严肃指出《西游记》小说“乃明人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在《道园全集》中亦无《西游记证道书原序》一文。故知所谓元人虞集序文及清人伪作，或许即出于汪澹漪、黄太鸿辈所自撰。

在明、清出版界一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埋没著者吴承恩大名时，却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在认真考究《西游记》的真正作者，澄清社会上的种种谬说。如清初学者吴玉搢，在乾隆十年（1746）纂修《山阳县志》时，见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即疑《西游记》的作者当为吴承恩。乾隆、嘉庆时的大学者纪昀，他虽未见天启《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但据《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

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因而断言：“《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如是我闻》三）至究系何人所作，纪昀尚未能知之。继吴玉搢之后，山阳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撰写《茶余客话》时，据旧县志亦认为《西游记》乃吴承恩作。嘉庆时著名学者兼戏曲研究家焦循，在所著《剧说》中，曾引用阮葵生《茶余客话》中论语，并考辨此事。朴学家丁晏在嘉庆、道光年间完成的《石亭记续编》一书中，力辨所谓邱处机作《西游记》小说之谬，证明此书乃是他的同乡吴承恩作。道光、咸丰间学者陆以湑在《冷庐杂识》中，博采纪昀、丁晏之说，断定《西游记》乃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为人所重视，多因循汪澹漪之旧说，甚至到一九二一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西游记》，胡适在《西游记序》中，还不知作者为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西游记考证》）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二年与胡适通信中指出作者为射阳山人吴承恩，在翌年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更据天启《淮安府志》及吴玉搢、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论见，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最后加工写定者。从此以后，学术界见解趋于一致。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为涟水人，后徙山阳（今属江苏省淮安县）。曾祖吴铭，为余姚训导；祖父吴贞，任仁和教谕。“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父吴锐，四岁丧父，由母梁夫人领取山阳故土居住，因“家世儒者，无资，且颠沛宦游，归益贫”，以致“社学先生不教先君书”。吴锐娶

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縠”，锐“遂袭徐氏业，坐肆中”为小商人。吴锐壮岁时因膝下无子纳张氏为侧室，生吴承恩。吴锐家道不富，且常为下吏欺压，“侮之，不应亦不怒”、“木讷迟钝”以避祸，人称“痴翁”。其实他并非麻木不仁者，他有理想，有识见，亦有血气：“爱玩群籍”，“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谭说史传，上下数千载，能竟日不休。每读书至屈平见放，伍大夫鸱夷，诸葛孔明出师不竟，周子隐战没，檀公被收，岳鄂武穆死诏狱，未尝不双双流泪也。”又“好谭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云。”（《先府君墓志铭》）

吴承恩出生在这样一个由书香门第衰落而为小商人的家庭，深受其影响。据他在《禹鼎志》序中自述：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河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

可知吴家藏书颇丰，他从小受喜欢博涉群籍的父亲之熏陶，又酷好唐人传奇，创作欲望很强烈。但遗憾的是《禹鼎志》这部短篇志怪小说集已散佚，从书名及序文中所叙臆测，其中定有不少大禹降伏水怪、山妖的传说，成为日后《西游记》中某些情节的雏型和试笔。

吴承恩性敏多慧，“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土为画，无不肖物；而邻父老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老吐舌异之”（陈文烛《花草新编序》）。“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学

者恒相属”(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吴承恩先受到才子朱凌溪、徐中行和本乡名士蔡昂的赞赏，后在淮安龙溪书院肆读时，又受到知府葛木(卮山)和讲学老师胡珪、王凤灵的赏识。葛木对吴承恩感情甚深，影响较大，经常劝勉承恩进取功名，以致承恩在三十多岁时赴南京应举落第后作《祭卮山先生文》中惭愧地说：“我实负公”，“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伤，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承恩“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利，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他空有盖世之奇才，因“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竟一生不能荣显。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吴承恩约四十三岁时中岁贡，之后十几年间又参加了三、四次考试而“屡困场屋”，不得拔擢。大约五十三岁时，吴承恩肄业于南京之南监，故有“太学吴子汝忠”之称(潘坝《淮郡文献志序》)。在吴承恩五十四岁左右时，他少年时的好友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倭，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率众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重修《山阳县志》)。沈坤常到吴承恩处谈方略，承恩亦参与军机。第二年，吴承恩为胡宗宪撰写《贺总制梅林胡公奏捷障词》，欲投笔从戎依宗宪幕而未成。因母亲老迈，家境清寒，又不善于谋生，吴承恩在六十多岁衰年进北京候选，想求一官半职，后赴浙江省长兴县任县丞。县丞是知县的助手，为正八品小官，与主簿“分掌粮马、巡捕之事”(《明史·职官志四》)。在任上生活得很不如意，故在《春晓邑斋作》诗中凄然咏叹：“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大约做了一年半的县丞，为征粮事得

罪长兴大豪，被诬为贪赃，与一掇令都被察院访拿，撤职罢官。吴承恩被解除系狱罪后，还有“荆府纪善之补”（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这是安置闲散人员，挂名拿干俸，或对赃吏从轻处理的一种安排。大概案情不久即弄清，吴承恩得到名誉的补偿，便退官回淮安，未去湖北赴任。此后，吴承恩放浪诗酒，以卖文、经商为生，终老于林下。吴承恩不仅诗文惊人，还甚通丹青，少年时“舐笔和墨，间作山水人物，观者以为通神佳手”，然不晓何因，自“弱冠以后，绝不落笔”（《花草新编序》）。吴承恩好交游，结识的权贵有：李春芳、胡宗宪、高拱、徐阶等人。结识的社会名流有：文徵明父子、徐中行、何良俊、归有光、沈坤、朱曰藩、陈文烛、黄姬水等人。吴承恩因“家贫无子”，逝世后“遗稿多散失”，后由宦归的表外孙丘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同治《山阳县志》卷十二《人物志》二），即《射阳先生存稿》。同乡好友陆遥收其遗文，张清溪、马竹泉手录其遗稿。晚辈吴国荣、张以衷、蔡翰臣参加了整理出版《存稿》的校刻工作。此书在清初时“刊版不存”，吴玉搢“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极渝敝，后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山阳志遗》四），这是最完备的本子。后来，不仅《续集》不见了，四卷刻本也难寻到。在乾隆四十三年（1777），吴进仅见到一残本，从中录出古文十六篇刊世，即《射阳先生文存》。一九二九年，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原刻本《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一九三〇年铅印问世。至于他的巨作《西游记》，则是他逝世约十年后由好友李春芳托名华阳洞天主人校订出版的，即明代金陵世德堂刻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

回。但这位宰辅大人没有署上作者吴承恩的名字，于是给后人添了不少麻烦，亦使吴承恩大名在几百年间不显，这的确是不应该的。

吴承恩虽一生悒郁，在政治上未能奋进，却是一位长寿的文学家。他活了八十多岁，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朝。他主要活动的年代，正是明代中衰时期，帝王荒淫无耻、昏庸腐败，朝廷权奸当政、朋党林立、互相倾轧。许多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大阉党，都产生在这个时代。如弘治年间的李广、蒋琮，正德年间的刘瑾，嘉靖年间的严嵩、徐阶，万历年间的冯保等。其中严嵩最险恶，刘瑾的阉党气焰最甚，以致对严嵩，“京师人又为之语曰：‘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之九《夏贵溪》条，亦见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六《谐谑》条）而在京师内外纷纷言说刘瑾之权势，竟有两个皇帝之传闻，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详见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〇〇《内臣》条）。不仅奸臣握柄，而且呼朋引类，排斥异己。如英宗时吏部尚书王翱是河北盐山人，他就反对南士，多引用北方人（《明史·王翱传》）；后来浙江桐庐人姚夔任吏部尚书，则排斥北士，多引荐南方人（《明史·姚夔传》）。武宗时内阁大学士焦芳是河南泌阳人，他深恶南士，每退一南人就高兴，甚至连谈古人时亦要借题发挥破口大骂南人，他还作一幅南人不可为相图送给刘瑾（《明史·焦芳传》）。明代后期的东林党亦有地方乡土因素。难怪清世祖顺治在与汉臣谈话时认为，北人南人各自为党，把

明朝搞坏了(《顺治东华录》二三)。

在明代皇帝中,武宗特别荒淫好色,他除了立“豹房”令四方献美供其淫乐外,每逢外幸更“大征女乐”,夺人妻女,“遍入寡妇、处女家”,以致每逢他临幸,“民间妇女惊避”(黄云眉《明史考证》)。这些上层统治者穷奢极欲,还想吃仙丹灵药长生不老,于是“一时方士如陶仲文、邵元节、蓝道行之辈,纷然并进,玉杯牛帛,诈妄滋兴”,或被封为真人、国师,获取高官厚位,或受赐庄田、金银,享受优厚俸禄。他们出入皇宫,深入禁地,“口衔天宪,威福在手,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明史·佞倖传》)。嘉靖皇帝当政四十五年间,只视朝一次,几乎天天在西苑举行斋醮,炼丹修道。而那些得势的方士,竟和《西游记》里的“真人”、“国师”身份、手段相类似。道教得势又引起宗教之争,佛教遂受到歧视、打击。据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之五十二《世宗崇道教》载:

〔嘉靖〕十四年夏四月,大兴隆寺灾……僧徒还俗者听,并移姚广孝神位。

十五年……五月,除禁中佛殿,建慈庆、慈宁宫。

这与《西游记》中车迟国王、比丘国王、灭法国王,堪称兄弟。当时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抨击朝政,力图革新,结果被囚、被杀,更兼以东、西厂和内厂的特务到处出没,很多人往往因为一言半语获罪而横遭虐杀。监禁、酷刑、苛税几乎威胁着社会上各阶层人的生存。在那冷酷险恶的政治气流中,不消说是普通百姓,就是士林亦噤若寒蝉。

吴承恩就生活在这黑暗、沉滞、恐怖的时代,他亲眼看

到社会上：

“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

他愤慨地揭露：

后来群魔出孔竅，
白昼搏人繁聚啸，
……………
坐观宋室用五鬼，
不见虞廷诛四凶。

（《二郎搜山图歌》）

并尖锐地指出，这残酷的现实：

匪独天数也，人亦有责焉。（《送郡伯古愚郡公擢山东宪副序》）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亦是明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激烈的年代。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土地的兼并、赋税的加重，以及无休止的巧取豪夺，使经济破坏，天灾人祸到处出现。皇帝、王公、勋戚、宦官所设的庄田数目之多，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弘治时京畿皇庄五座，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至正德时增为三十六座，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余顷。朝中大臣、地主官绅也上行下效，兼并土地成风。如严嵩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余处，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明史·邹应龙传》），而他家乡袁州一府四县之田，十分之七皆被其侵占。徐阶在江南占田达六万，江西安远叶占田达八万。在兼并土地过程中，还强夺民产，烧毁房屋，铲平坟墓，砍伐树木，甚至伤人、害人（李梦阳《论三害》）。同时官僚贪污成风、军费支出庞大，政府“每年所入

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在嘉靖三十年于南畿、浙江省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名曰“加派”；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叫作“提编”。之后，更出现箕敛、派括、算税契、折民壮等等“加派”之名目。（详见《明史·食货志》）地主豪绅持有特权，可以免赋免役，广大人民如牛负重、困苦不堪，遂有大小不同规模的起义在各地不断发生，此起彼伏。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武宗正德实录》、《罪惟录》等书记载，仅在武宗年间比较大的起义就有：山东的刘宠、刘宸，四川的方四、曹甫，江西的王钰五，河南的师尚诏和广州的曾一本。除上述农民起义外，还多次发生城市居民的暴动。这些起义和暴动，虽先后被镇压了，但他们却沉重地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加速其灭亡，并显示出人民群众潜在的力量。吴承恩处于社会的中、下层，又多次宦游，很可能结识过一些江湖豪客，耳闻目睹过一些农民起义的事迹，尽管他为封建正统思想所囿，不敢公开明显地对“草莽英雄”们表示同情，但严肃的现实对具有正义感的作家吴承恩，在塑造孙悟空这一形象时，不能毫无影响。在这衰败的景象中，又连年遭逢外族入侵和倭寇抢掠，更战火不息，民生涂炭。当时，北有达延汗之孙俺达汗屡屡犯境，东南沿海有倭寇经常骚扰。俺达汗即《明史》中所称的“小王子”，他势力较强，又因明朝边将把“诸边军粮，强半贿嵩”（《明史·丁汝夔传》），军士饥疲，边防大坏，以致在嘉靖一朝内竟出现鞑靼兵三逼京师的危急情况。倭寇自十四世纪开始侵掠，因在永乐年间被明总兵刘江率兵在辽东望海涡战役中一举歼灭（详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日本》），此后很长一段时

间不敢大规模骚扰。待到嘉靖时，倭寇与沿海豪强富商勾结，有了内应，复又猖狂。明朝派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他到任后逮捕了一部分内奸，又积极训兵，堵击倭寇，取得一些成绩，不料得罪“闽浙大姓”被诬下狱，逼迫自杀（《明史·朱纨传》）。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严嵩当政时派义子赵文华督视海防，他们私通倭寇，倾陷御倭督臣张经，激起人民极大愤慨。吴承恩目睹国家多难，奸臣弄柄，正直有用之士惨遭杀戮，遂作《重刻金陀粹编序》痛悼民族英雄岳飞之死，唾骂秦桧“奸邪误国”。在《平南颂》中更倾吐他对“恃海为梗，依丛啸凶，蹂两浙、残三吴”的倭寇切齿之恨。但遗憾的是把这篇“颂”献给赵文华，不免失身价，为后世窃笑。他在《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一路上降妖除怪，恐怕也是有所寄托的。但在这沉闷的时代，也出现了象王良、李贽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思想家，提倡个性解放（“造命”），反对统治者过多干扰人民，过分地用严刑峻法和封建礼教束缚人民。这种强调个人作用，反对与命运妥协，认为人应改变环境的大胆思想，对吴承恩不愿受世网羁勒的心，一定会产生某种心灵上的共鸣的。社会黑暗沉滞、个人境遇坎坷，胸中激荡着悒闷风雷的吴承恩，尽管“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但愤激的情绪还是要时时流露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文中，更表现在《西游记》中。这个曾为几个世纪的人不断创造、不断丰富传统题材——西天取经的故事传说，遂与他的心境发生共鸣，使他将一腔悲怨、毕生理想，凭借“善谐谑”（天启《淮安府志》）的本领，把自己的卓越才华和后半生心血倾

注到《西游记》的创作之中，用这神话的奇幻酒杯，寄托襟抱，浇胸中块垒，正如传说中的天鹅，在临终前唱出一曲美丽而悵怨的歌。

《西游记》虽经吴承恩之手完成，但并非全是他个人之功，它形成的过程与歌德《浮士德》有相似的命运。它原是一个历史悠久，流传很广的故事，后来经过历代劳动人民和作家的不断加工，不断丰富，并留下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特色的艺术创作底本。最后，这个神奇的故事，正象在歌德手中完成的重新创作的《浮士德》一样，它经吴承恩之手使之不朽，象一颗灿烂的明星，永远熠熠于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之上。

《西游记》中的故事是怎样产生，并逐渐衍变、充实、完善的呢？《西游记》中的主人公唐僧，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祜，洛州缑氏（今属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人。约于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出家，博涉经论，是一位笃学的僧人。他因感到有些翻译的经典讹谬太多，真伪难辨，遂以求实精神决定不远万里去天竺（印度）就学。唐贞观三年（629），玄奘曾陈表朝廷奏请西行“遵求遗法”，因唐太宗为自炫家世崇尚道教，故未被允纳。玄奘被迫决定私出国界。因守卫烽火台的官吏王祥、王伯陇好佛，护送玄奘从野马泉越境。出国后，他曾被困在茫茫流沙中，“口腹乾焦，几将殒绝”。到了伊吾，被高昌王鞠文泰好意扣留，通过绝食斗争始获释。临行时，鞠文泰与玄奘“约为兄弟”。此后，玄奘持高昌王书信，以王弟的身份，在叶护可汗等人保护下，前后四年始达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玄

奘先在那烂陀寺戒贤门下学习五年，后又到杖林山师兄胜军处学习二年。在戒贤那里他看到瑜伽学说全豹，又在胜军那里廓清余疑，穷究了唯识论的奥蕴，使他在学识上大大地超过一般佛学研究者的水准。玄奘出国达十七年之久，历经五十余国，在天竺多次主持讲学和召开辩论会，以其渊博学识震惊异邦。在归国途中，至信度大河中流遇大风，船几覆没，守经人惶惧堕水，遂失五十夹经本及花果种等。过河后，玄奘暂停乌铎伽茶城约五十日，派人重往乌长邨国抄写失落水中经文。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远涉归国。玄奘到长安不久，唐太宗在洛阳召见他。太宗劝玄奘“罢道助乘俗务”，希望他还俗做官，被玄奘拒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在政府资助下设“译场”，他与门人窥基、辩机等人用十九年时间翻译重要经论七十五部，约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著《大唐西域记》。有关玄奘的史料，见刘昫等撰《旧唐书·方伎传》、道宣编《续高僧传》卷四中《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宋释志磐著《佛祖统纪》、元释噩梦堂《唐宋高僧传》、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等书，但记叙最早最详的则是他弟子慧立撰写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它虽系据玄奘口述加工整理，并非信史。什么事一出自宗教徒之口就不免夸大失实。玄奘在古代交通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去国离乡，万里跋涉，并以其学识声震异域，就带有传奇色彩，再加上慧立绘声绘色描述，引入异境听到的各种神奇传说，添上宗教徒热狂的思想，已经就有点传奇小说的味道，够迷惑人了。因此，玄奘取经故事，沿着两条路发展：它不仅在佛教徒中

流传,而且渐渐走入民间,成为引人注目的文艺题材,二者互为影响,彼此传异。自唐代中叶以后,社会动乱,人心不安,思想消极,释教大炽,便有种种取经变文、取经故事在社会上流布,并特别为文人或民间艺人重视和采用,他们在广泛地吸取民间流传的种种取经故事的基础上,又参看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中某些神话传说,如“龙池”、“首出九龙之头”的怪物、“女人国”、“梵天王”、“罗刹女”等,并运用大胆的、丰富的想象,将各种材料加以脱胎换骨的改造,于是一部完全脱离原始材料的文艺作品便赫然问世了,这就是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据鲁迅先生推考,此话本“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先生在为此话本所写《跋》文中,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考,中瓦子张家为南宋临安书肆,故断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本为“宋槧”;但王先生在《两浙古刊本考》卷上“辛、元杂本”项下,又定此话本为元槧。我推测今存刊本或为元人印行,但在宋代一定有类似的作品出现。第一,此书从形式上看,有诗有话,诗的性质近似于佛经中“偈赞”,话文部分与佛经相类,它与唐、五代“讲唱经文”的“俗讲”相近,可能是北宋时期的作品而较晚刊印的。第二,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艾子杂说》中提到唐三藏。南宋诗人刘克庄《释老六言十首》中,除第四首提到“取经烦猴行者”外,在其他九首中,还提到惠能、老君、大鹏鸟、金毛狮子、青牛、如来等,此中“猴行者”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独特的称谓。而